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 现代文学论文选粹

吉林大学出版社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 现代文学论文选粹

〔日〕伊藤虎丸

刘 柏 青

金 训 敏

合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626456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

〔日〕伊藤虎丸

刘 柏 青 合 编
金 训 敏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787×1092 32开 14印张 312 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册

ISBN 7-5601-0033-3/1·3

统一书号：10323·16 定价：2.20元

出版说明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二十余篇。此书系日本东京女子大学伊藤虎丸教授在东京大学丸山昇教授的协助下，与吉林大学刘柏青、金训敏合作编辑而成。中日学者这种形式的合作，还是一个创举。

所收文章，以鲁迅研究为主，旁及其他作家研究，在日本都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供大学中文系学生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参考。论文的作者，主要是“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还吸收了日本关西方面的几位知名学者竹内实、相浦杲、山田敬三等。

译文力求精确。中国方面译校之后，寄送给日本作者，经作者推敲修改之后，送交日本方面的主编校改，然后再寄给中国方面的主编。经过这样的反复推敲修改，比较地能够保证译文的质量。

这个集子的出版，除具有一般的人所共知的意义外，还能起到鼓舞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士气的作用，“聊以慰藉在寂寞里奔驰的战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把研究的事业坚持下去，从而也就使得我们的现代文学以更坚实的步伐，走向日本，走向世界。

HAB 904

目 录

为了心灵深处的交流

——代序……………伊藤虎丸著〔1〕

论三十年代文学

——从对“左联”和鲁迅的研究谈起

……………丸山昇著 阎桂生译〔10〕

鲁迅与裴多菲

——《希望》材源考……………北冈正子著 张宇宏译〔47〕

鲁迅与中国古典研究（下）

——厦门和广州时期……………山田敬三著 邱华盛译〔77〕

鲁迅小说的一个侧面

——主要谈《药》……………相浦杲著 赵卓译〔97〕

鲁迅的短篇小说《明天》

……………中岛长文著 李凤吾译〔128〕

阿Q人名考

——“鬼”的影像……………丸尾常喜著 金训敏译〔141〕

创造社和日本文学……………伊藤虎丸著 白木石译〔167〕

郁达夫留学生活及其诗

——到《沉沦》为止……………稻叶昭二著〔212〕

在“第三种人”论争中的冯雪峰

——及其与“中间派”文学家的关系

……………前田利昭著 潘世圣译〔221〕

钱杏邨的“新写实主义”

——与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有关问题之考察

……………芦田肇著 靳丛林译〔263〕

记胡秋原

——胡秋原与三十年代文艺

……………佐治俊彦著 郝长海译〔296〕

与陈独秀分道扬镳的周作人

——以一九二二年非基督教运动中的冲突为中心

……………尾崎文昭著 李光庵译〔322〕

从文言到口语

——中国文学的一个断面

……………木山英雄著 毛林广译〔345〕

胡适和印象派诗人

——对“八不主义”的影响的考察

……………釜屋修著 蒋运荣译〔360〕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

——中国儿童文学小议之一

……………新村彻著 李庆国译〔386〕

附：昭和文学中的中国面貌

……………竹内实著 李冬木译〔403〕

为了心灵深处的交流

——代序

伊藤虎丸

东京西住宅区的一角，有一所小小的大学，名为东京女子大学，于一九一八年由外国基督教会的捐款而建立以来，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在日本可以说是最有名望的女子高等教育机关之一。校园很闲静，尤其后园，大树亭亭，小鸟儿整天鸣叫。在现代化正在高速度地进行的东京这一城市里，仍保留着建校当年的“武藏野（Musashino）”的风致。林间有几所学生宿舍和外宾宿舍散在。

一九八三年六月，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刘柏青先生，为了促进日中两国学者的“学术交流”光临日本，在此校外宾宿舍里逗留了几天。我就这样认识了刘先生。这一本论文集的编刊，也正是在此宿舍的客厅里与刘先生共同商定的。

我们迎接刘先生后，当天就在校内的比较文化研究所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由我主持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这位先生当时由北京大学派到东京大学教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尾上兼英，东京大学文学部的丸山昇，一之橘大学的木山英雄等等二十几位。题目为“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艺所受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首先由刘柏青先生做报告，然后由丸山昇介绍

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三十年代文艺研究的历史概况。（参加会议的名单及报告内容已登在该研究所的季刊《比较文化》第8号上。这里从略）会后，由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邀请先生们在外宾宿舍的餐厅里开了一次欢迎会，学长隅谷三喜男致欢迎词。

过了几天，我陪同刘先生乘新干线往西下，在神户大学，同伊藤正文、山田敬三，笕久美子，片山智行，北冈正子等一起参加了“鲁迅与日本文学”的研讨会。刘先生在此会上也当了中心发言人。然后，刘先生还访问了京都大学、广岛大学、九州大学、长崎大学等。同各地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做了几次报告。此处不一一介绍。

刘先生回到东京，将要回国的前夜，我想要告别，就去那后园里的宿舍拜望先生。当时，互相略微寒暄几句以后，先生就改客谈起他对于祖国文化建设的热情，而郑重其事地向我提出了一件事。即为加深中日学术交流起见，要共同编写一本日本学者研究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论文集，并将在中国出版。

原来我有个倔脾气，因为对于“交流”“友好”之类的口号，从来不大感兴趣。加之我是个懒汉，又怕羞，因为工作很忙，也不喜欢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尽管如此，这次我当场便接受下来了。因为我虽然同刘先生相识还不到二旬，可是在多次接触中，我已感到先生的为人仁厚，学识渊博，特别是先生当时提到这个建议时，态度很严肃、认真、颇使我感动。当时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应该积极地跟这位先生同心协力，尽些力量。因此我便不顾自己学问的疏浅，力量和水平的不足，当场就答应选几篇日本学者的论文寄到吉林大学，请先生翻译。后来在丸山昇的赞助下，完成了这个工作。

同时，我也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把这些论文译成中文后，一定给我们寄回来，让原著者看一下，给予他们自己校稿的机会。刘先生也当场答应我提出的做法。

我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呢？目的自然是希望有准确的翻译。翻译本来应须是准确的。而所有的翻译都不能准确。翻译是根本上具有这样两种性质的工作。而我为什么偏偏又提起要准确来？当时我正回顾近代以来日中文学交流发展的历史，以及考虑到现状的。

* * *

1936年夏天，日本有名的作家井伏鱒二想出一本作品集，书名打算题为《鸡肋集》。他的朋友小田嶽夫告知他：中国的作家郁达夫已有《鸡肋集》，你应该写信给他，愿他谅解才好。井伏就写信给达夫，达夫也回他一封信，信里说：“书名一事，当然不成问题。从前梅特林写‘马利亚·马格达利’那剧本时，闻道德国的Paul Heyse已经写过同名的作品，当写信告知想借用书名时，听说Heyse先生总不答应。洋鬼子的事情，真是奇怪……”（原文是用日文写的。这封信的全文，我从井伏先生那里借来，已收于《郁达夫资料补篇（下）》里面）。

在这里，郁达夫用“洋鬼子”（原文是日语“毛唐（Ketou）”）这个字眼，来表示中日两个民族是“同种”（这是黄公度在《日本杂事诗》的序文里用的字眼）的亲密感情。从这封信里，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中日两国文学家共同保有的两种“教养”。

一是“汉文”的教养。那时候两国文学家，一看“鸡肋”这个字眼时，互相就了解这一句的含意。二是“西洋近代文学”的教养。在这封信里，郁达夫提起Maeterlinck

和Heyse的故事来，当做他们之间共通的话题。……总之，那时候他们之间好象有一种用了共通的语言来谈谈文学和艺术，感情互相能相通的亲密关系似的。

然而，我们能不能说这时他们之间有真正的互相了解？就在两年后，郁达夫在《抗战文艺》第1卷4期上写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里面说：“我们因为在日本住的日子长一点，所以平时交游的日本文士，也比较得多。……但是疾风劲草，一到了中日交战的关头，这些文士的丑态就毕露了。我们原有点被他们欺骗了的后悔……”。

达夫与佐藤，当时已有了十几年的亲密交游。达夫曾写过：“在日本现代小说家中，我所最崇拜的是佐藤春夫”（《海上通信》），而现在他说：“被他们欺骗了”，如众人所知，激起达夫的愤恨的直接原因是佐藤写的《亚细亚之子》这一篇恶劣作品。但我想：这件事不单是达夫和佐藤之间的个人感情上的问题，也不是“一到了中日交战的关头”，才发生出来的事件。这件事是关乎日中两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史上，有象征性的一个事件。实际上我们可以说：自此以后两国之间的“文学上的交流”是断绝了。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

这样断绝或隔膜的直接原因，自然是侵略战争造成的。但，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状态，而两国文学家仍保持着交流或互相了解，这样关系也常有的。然而，一般的情况来说，日中两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不是这样的。除了少数个人（特别是左翼作家）之间的关系之外，大体上“心灵上的交流”也断绝了。为什么呢？

1945年以来，我们从来认为，日中文学断绝的真正原因，不~~只是~~战争，而也有日本文学家（包含佐藤等人在

内)的思想上的原因。可是到现在,我又感到,交流断绝的真正原因,不仅在此。除了“思想”上的问题,在心灵的深处还有“文化”上互相没有(或者不能)了解的问题。

这里我为什么勉强分开“思想”和“文化”呢?这里我所说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也好,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也好,——就是指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而言的。这些都是有关理性或知识而不关民族性的。反之,“文化”是有关各个民族的长期的历史社会培养成的“特殊性”的东西。个个具有“个性”的。“个性”本来不能是彼此比较而评价的东西。所以,“文化上”的互相了解,比“思想上”的了解更困难。

譬如说:中日两国左翼文学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了世界和平共同协力。这当然是我们应该常常回顾,永远纪念的事。但是,他们之间有过的互相了解是“思想上”,而不是“文化上”的。郁达夫在上引的信里说:“疾风劲草,一到了中日交战的关头”日本文士的“丑态就毕露了”。自然我也承认佐藤春夫这位作家“思想上”有问题,应该批评的。可是,佐藤他们是否“一到了中日交战的关头”才变了节呢?我想不是,佐藤他们本来根本上不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不能不承担的历史任务和它的性质。郁达夫这位作家,怎样亲近西洋文学和日本文学,也还是一个中国现代作家。而达夫方面也有对佐藤他们的误解。这样他才有了“有点被他们欺骗了的后悔”吧。我想,这样的误解不但是“思想”上的,而且是“文化”上的。

近十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然恢复了“国交”,经济上、工业技术上的交流日日扩大,所谓“文化交流”也渐渐地多起来了,但是,就“文学上的交流”来说,我想,那四

十几年以前的郁达夫和佐藤春夫他们之间有过的互相了解也还没恢复。要说到上面所提的“两层教养的共有”，我却不能不感到，越来越隔膜起来了。——譬如，今天日本青年作家之中，有几个人看“鸡肋”这个字的时候，就明白“存之可羞，弃之可惜”的意思呢？两国文学家之间，关于近代的文学和艺术，有多少共同了解或共同言语呢？所以，我冒昧地说：国交虽然恢复了，文化上的国交还没有恢复。

* * *

翻译——尤其是有关文学的翻译，是我这里所提的“文化上的国交”的最具体的表现。翻译是一座桥梁。通过翻译才能相互了解。“了解”这个字眼本来意味着“认识对方跟自己的不同或差异”的意思。

文学，本来一方面是“思想”的表现，一方面则是“文化”的表现。如上说，“思想”是有普遍性的，可以用共通的尺度来比较，所以了解和翻译容易一点儿。“文化”是各有“个性”，不能象“思想”那样用先进和落后的标准来衡量的。翻译的难处，也在这里。

这两年以来，我们正在进行《鲁迅全集》的翻译工作。从事这件工作以来，我常常感到了解外国文学的困难。对自己的翻译心里不踏实的地方很多。这自然是我的中文水平很低的结果，可是这里也有我所说的“文化”上的问题。近来在中国书刊上也有时登载我们日本人的论文。对于这样的翻译工作，我们很感激。但是我们看译成中文的自己写的论文时，有时也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我想，这里也有“文化”的问题。

本来我们日本人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比西洋学者有点

有利的地方，但究竟是外国人的研究。跟本国人的研究比起来，除了有关日本文学的资料之外，关于中国文学的知识和了解，一定是很浅薄的。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万一有益处，那原来不在知识和资料方面，而在跟本国学者不同或有差异的观点和方法方面的吧。但是中国先生们把我们的论文译成中文时，有时不免有错误，也正在这样的观点和方法有差异的地方上。

这样的中日双方的翻译情况，我想，就是两国之间的“文学上的交流”和“文化上的互相了解”的现况的最直接的反映。我深深地感到，为了实现“世世代代的友好”这远大理想，首先我们应该克服这样的情况。所以上面敢说，两国文学之间，四十几年以前的关系也还没恢复。刘柏青先生提起编写这本论文集的建议时，我提出给原著者自己校译稿的机会这一个要求的理由，也正在这里的。

* * *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竹内实先生，曾出一本书题为《友好容易理解难》。书的内容这里我不敢涉及，一看这书名时，我就感到著者说得真妙。高喊“友好”是容易的，可是真正的“友好”，是在正确“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筑成的。我们的翻译工作，我们文学研究上的交流，比经济上，工业上的交流，当然“事若甚微”。但这也是我们过去不幸历史学来的一个有关增进两国人民心灵深处的互相理解的工作。理解是认识相互的不同之谓，深知不同，以后才有真正的友好。这是我们从过去的历史学来的教训。可是互相的不同，各有不同的来由。这是有关历史和社会（就是我所说过的“文化”）的。所以“理解难”。翻译是应有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的一件很困难的工作。

这次，刘柏青先生和其他先生们，费了很大工夫，认真地翻译我们的论文。刘先生把译稿送来给我们看。我们的原著者，也费了很多时间，很吃力地把它修改，注明意见，然后又送回吉林大学，供译者先生们的参考。

坦率地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我们有时甚至感到，怎样翻译也不能传达给中国朋友我们要说的内容。我们耽误了很多时间，给刘先生添了很大麻烦。可是我又想，这样的共同工作已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交流”。通过这次工作，我想，咱们加深了互相了解。

今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的李何林先生，为了纪念我们的《鲁迅全集》日译本的出版，在该文集第五卷的《月报》上，发表一篇文章，篇首引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自然，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正如李先生引鲁迅的话说，文艺是“沟通”心灵上的交流的“道路”。可是到现在，还是“走这条道路的人又少得很”。此次我们两国文学研究者共同协力从事这“沟通”工作。我想，这样的共同工作，从来大概是少有的。这一本小小的论文集的意义也在这里。

李何林先生那篇文章，还引鲁迅先生的《题三义塔》诗，庆祝我们《鲁迅全集》日译本的出版。然而我想，鲁迅所写的“劫波”到现在还没“渡尽”。我相信又知道，到现在还有许多“精禽”、“仍啣石”的，也衷心情愿，这一本我们共同努力的小小的结实，也能当精卫的一石。

这本书里辑录的论文，著者的观点、方法各自不同，我

不能也不应该当代表概括它的内容。所以这里只是为了致谢刘柏青先生，译者先生们和原著者们，略谈编刊的缘起，以代序。

1985年6月 在东京·小金井

〔附记〕

这一篇《代序》，是伊藤虎丸先生用汉语写成的，它大体上说明了编辑这本文集的缘起。时间过得真快，这本集子的编成是在两年半以前，现在已是时过境迁了；但能有机会出版，总是令人高兴的。集中所收论文，似乎杂了一点，而有些论点，自然是我们难以苟同的，但要看看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学有些什么议论，藉此开开眼界，增长见识，这本集子的出版还是有益的。只是出版太晚了，是应该向伊藤先生及其他几位作者致歉的。还有，这本集子原本收入了东京大学尾上兼英先生的文章《鲁迅与尼采》，后因译者等不及本书的出版，先在刊物上发表了。限于篇幅，这里没有收入这篇文章，谨向尾上先生致谦。

——刘柏青

论三十年代文学

——从对“左联”和鲁迅的研究谈起

九山 昇 著

前 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谓三十年代是指从一九二八年的“革命文学”论战至一九三七年日中全面开战，即中国所说的“抗日战争”开始之前这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通过“革命文学论战”，创造社、太阳社中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鲁迅之间，形成新的统一，从而导致一九三〇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此后，以“左联”为中心，展开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进而于一九三六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展开了“国防文学论战”，这场论战即将结束时，鲁迅逝世了。如果从年代上来讲，抗日战争开始后，也应属于三十年代，但是由于在文艺上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和内容，因而一般来说不属于“三十年代”。实际上在中国革命史中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相当于这段时间。另外，谈到“三十年代文艺”时，主要指上述以“左联”运动为中心的创作，一般认为，虽然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但创作的题材主旨与左翼作家不同，例如巴金的《家》（三三年）、老舍的《骆驼祥子》（三六年）、沈从文

的《边城》（三四年）等，虽然做为同时代的人，有着相当深刻的联系，但从狭义上来讲，也不属于“三十年代文艺”的范畴之内。

这个时期的文学，现在又作为一个问题重新提出来，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开始的。正象众所周知的那样，最先用“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是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的社论。其中对于这一时期，提出了如下的评价：

“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斗争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了马克思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来的。”①

如同以后事态发展过程中所证实的那样，在该社论发表之前，同年二月二日至二十日，曾召开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并写成了《纪要》。上面的文章，几乎是以《纪要》为准则，原封不动地写成的②。